

西方跨文化交际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呈现研究

迟若冰¹ 刘俐^{1,2} 张婷婷^{1,2}

(1. 上海外国语大学 跨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 200083; 2.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上海 201620)

提 要: 跨文化交际教材是学生系统学习跨文化理论、间接接触不同文化、参照理解自身文化的重要媒介。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 由三位编码员共同对八本西方出版的主流跨文化交际教材进行三级主题编码, 分析其中的中华文化呈现情况, 发现: (1) 此类教材呈现的中华文化内容包罗万象, 既有传统文化也有现代文化, 涵盖了文化产品、实践、观念、个体与社群以及地域五大类别; (2) 通常在正文中对跨文化理论概念举例说明时出现, 或作为案例人物、事件的背景出现; (3) 若与其他文化同时出现, 多作为典型的东方文化, 与西方文化相对应; (4) 教材中既有对中华文化偏静态、同质化、去语境等过度简化的本质主义取向式理解, 也有更为动态、杂糅和情境化的复杂理解。研究探讨了跨文化交际的学科特点与其教材文化呈现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 为本土跨文化交际教材建设提供实证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 教材研究; 文化呈现; 中国文化; 跨文化交际

Abstrac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extbooks are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students to systematically learn intercultural theories, indirectly come into contact with

基金项目: 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教材研究院外语教材研究项目“西方跨文化教材中的中华文化融入与呈现”(编号2022SH0013);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外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专项课题(编号41004666)。

作者简介: 迟若冰, 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跨文化传播、跨文化教育; 刘俐,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婷婷,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different cultures, and understand their own cultures in comparative contexts. This study employs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in which three coders jointly conducted three-level thematic coding of eight mainstream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extbooks published in the West. By analysing the presen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rein, the study found that: (1) Chinese culture presented in these textbooks is all-encompassing, including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elements, and covering five categories: cultural products, practices, perspectives, people and communities, and places; (2) it usually appears in the text to illustrate one aspect of a cross-cultural theoretical concept or as the background of cases; (3) if it appears together with other cultures, it mostly serves as the exemplary Eastern culture, the opposite of Western culture; (4) presen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an be either static, homogenised, decontextualised, and oversimplified, or dynamic, hybrid, complex and contextualised. The study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a field of study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its textbook, and provides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extbooks.

Key Words: textbook analysis;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 引言

教材在外语教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学科知识、思想和观念的重要载体（吴立宝等 2016），也是学生学习、教师教学的主要依据和参考资料（孙有中 2020；徐锦芬，刘文波 2023），因此教材研究对外语学科建设意义重大（王文斌，李民 2017）。新时代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被赋予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文明互学互鉴”的使命，强化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理解和中国立场的人才目标（刘宏等 2020）。当下外语教材如何对接新历史时期的育人目标和教材建设的新使命等问题还有待深入探索（霍炜，王雪梅 2023）。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外语教材如何选择和呈现不同文化，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外语教学理念、目标和方法的发展变化一直是外语教材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Risager & Chapelle 2013）。当下外语界对文化多样性、文化自信和跨文化沟通的重视，进一步推动了外语教材中的文化呈现研究。国内外学者对不同学段、不同语种（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教材的分析显示，外语教材普遍注重融入文化元素（Shin *et al.* 2011；Tomlinson & Masuhara 2017），且大多具有以目的语核心圈层文化为主体、注重表层文化而忽视深层文化呈现的特点（康莉，徐锦芬 2018）。近期研究还发现，国内新出版的外语教材开始越来越有意识地融入中华文化和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内容，以对接外语学科的育人新需求（李加军 2023；张铁夫等 2023）。

然而，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文化呈现研究都集中在语言类基础教材上，而广义的外语教材还应包括语言学、文学、翻译以及文化等专业方向教材（程晓堂，赵笑飞 2021）。其中，刚被列为英语专业高年级核心课程的跨文化交际学教材对文化的呈现情况还未有过系统梳理。跨文化交际学是关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之间交际的学问（翁立平 2021），在学科育人理念和教学内容方面先天注重对文化意识的培养和对文化多样性的普及，在教材中理应会更加有意识地、系统地呈现不同文化。跨文化交际教材呈现哪些文化？如何呈现文化？与语言类基础教材的文化呈现有何不同？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跨文化交际学起源于西方，后经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引入国内，教学中多用原版教材，而本土自编教材的内容和结构也大量借鉴自国外同类教材（索格飞等 2015）。因此，了解国外跨文化交际教材塑造的中华文化形象有助于为本土教材的建设与开发提供借鉴与参考，进一步推动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学科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外语专业培养具备国际视野、文化自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人才目标（文秋芳 2022）。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选取了在国外出版的、以英语撰写的八本主流跨文

化交际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聚焦其中的中华文化元素，通过内容分析，管窥跨文化交际学科里的中华文化呈现特点。

2. 外语教材中的文化呈现研究

外语教材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偏向实用主义，旨在通过系统性分析、评估教材开发、编写或使用中的实际问题；另一类研究采用科学性、哲学性或批判性视角，旨在考察教材传达的世界观、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教学理念（Risager & Chapelle 2013；Weninger 2018）。外语教材中的文化呈现研究多属于后者，主要通过分析教材中涉及的文化内容、文化多样性的呈现、不同文化的占比等，探讨教材应如何处理文化学习与语言学习的关系、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培养文化自信和跨文化能力等问题。

外语教育界普遍认为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相辅相成，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也密不可分（Kramsch 1993；文秋芳 2016）。因此，文化一直是外语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Chapelle 2016）。大量实证研究发现，教材对国别文化的呈现通常以目标语文化圈为核心，同时兼顾本土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其他文化或跨文化群体。这与传统教学法将目的语及其文化作为衡量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结果的主要标准有关（祝华 2019）。比如，世界各地的英语教材中涉及的文化主要以英语内圈国家为主，较少涉及英语外圈或扩张圈国家的文化（Cortazzi & Jin 1999；Risager 2020；Shin *et al.* 2011；Weninger & Kiss 2013；张虹，于睿 2020）。不仅英语，对其他语种，如法语、德语教材的文化呈现研究也都有类似的发现（Risager 2018；葛囡囡 2022；马小彦，潘鸣威 2023）。

外语教材所呈现的文化内容一般有几类归纳方式。Moran（2001）的划分在此类研究中最常见，包含文化产品、文化实践、文化观念、文化人物和文化社群五个类别。也有将文化按范畴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Stern 1992；Lee 2007），按功能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张

占一 1990), 或者按主题分为社会身份与群体、社会交往与互动、信仰与行为、社会与政治机构、社会化与生命周期、国家历史、国家地理、刻板印象与国家认同八类 (Byram 1989)。

无论采用何种分类方式, 整体而言, 外语教材的文化内容主要关注表面文化, 既文化的可见部分, 如人工制品、产品和习俗, 而较少涉及价值观、信仰和态度等深层文化要素, 并且缺乏系统性的呈现 (Irawan & Daud 2021; Jorfi *et al.* 2022; 康莉, 徐锦芬 2018; Shen 2019; 张虹等 2021)。此外, 也有不少研究指出, 外语教材的文化呈现存在母语文化缺失的问题 (张蓓, 马兰 2004; Xiong & Qian 2012; 刘艳红等 2015; 康莉, 徐锦芬 2018; 闫洁, 吴进善 2019; 张雪梅 2019), 外语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常以翻译或选词填空等练习形式隐性呈现 (张虹, 于睿 2020)。

随着跨文化外语教学的不断发展, 国内外学者也开始关注外语教材中跨文化内容的融入 (如Siddiqie 2011; Irawan & Daud 2021; 李加军 2023; 张铁夫等 2023)。李加军 (2023) 通过分析大学通用英语教材《大学跨文化英语综合教程》中呈现的文化内容, 指出在跨文化教育理念的指导下, 该套教材的文化国别呈现更加多样化, 既包括普遍文化, 也包括具体国别文化, 且在内容上自觉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信息除了在篇章和语言练习中有所呈现外, 还有专门聚焦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文化练习这一特别形式。张铁夫、王凯伦和袁睿 (2023) 考察了《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中与跨文化能力培养相关的文化呈现情况, 指出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该教材的编写原则之一, 因此, 在选材上覆盖多元文化 (既有英语国家, 也有非英语国家, 同时兼顾母语文化), 练习中的交际型活动设计也充分体现了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跨文化能力培养目标。可见, 基于跨文化交际理念编写的外语基础教材中的文化内容更加关注文化多样性的呈现和文化自信的培养。

此外, 也有专门针对跨文化交际教材的研究。多数是通过分析教材内容梳理学科的知识结构和发展脉络 (如胡文仲 2007; 迟若冰 2010; 索格飞等 2015)。个别研究采用批判性视角, 旨在揭示特定文化呈现背后

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例如, Chang Hui-Ching等(2006)以Martin和Nakayama编写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s* (4th ed., 2007) 和Samovar、Porter、McDaniel编写的*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6th ed., 2007) 两本美国经典教材为例, 从文化主题、选择性用词和话语策略等方面分析了教材中关于东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作为文化他者的表述, 批判了跨文化交际教材中隐性存在的东西方二元对立和欧美中心主义取向, 指出了发展亚洲文化视角的必要性(Chang et al. 2006)。Zhang Yu等(2022)对我国出版的《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教程》(2009/2015)的内容分析也发现其中存在对东方文化的过度概括、污名化和刻板化, 基于民族国家身份的东西方二元对立, 以及以英语国家为中心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等问题。可见, 虽然文化是跨文化交际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但对其教材中的文化呈现全貌, 以及对我国文化的涵盖等问题还知之甚少, 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分析。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聚焦两个研究问题: (1) 西方跨文化交际教材呈现了怎样的中华文化? (2) 西方跨文化交际教材如何呈现中华文化? 存在哪些问题?

3.2 教材选取

在综合考虑出版时间、出版社、作者的文化和学术背景等多重因素后, 根据差异最大化原则(Douglas 2022: 418), 本研究选取了近15年来在国外出版的用英语撰写的八本代表性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它们都是面向本科及研究生群体的跨文化交际学基础教材, 在西方国家广泛使用, 部分已被引进国内。教材作者既有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西方学者, 也有来自中国、日本、斯洛文尼亚等地的移民学者。

所选教材基本信息见表1(按出版时间排列):

表1 所选跨文化交际教材列表

序号	书目信息	意群数量	总页数
1	Holliday A, Hyde M & Kullman J. <i>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 for Students</i> (2nd Ed.). Routledge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33	336
2	Ting-Toomey S & Chung L C. <i>Understand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i> (2nd Ed.).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76	352
3	Baldwin J R, Coleman R M, Gonzalez A & Shenoy-Packer S. <i>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Everyday Life</i> .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2014.	97	350
4	Jackson J. <i>Introducing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i> . London: Routledge. 2014.	91	433
5	Zhu H. <i>Explor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 in Action</i> . <i>Routledge Introductions to Applied Linguistics</i> . Abingdon: Routledge. 2014.	51	280
6	Liu S, Gallois C & Volčič Z. <i>Introduc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s and Contexts</i> (2nd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5.	104	385
7	Judith M N & Nakayama T K. <i>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s</i> (7th Ed.). Boston: McGraw Hill. 2018.	90	569
8	Halualani R T. <i>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ritical Perspective</i> . Solana Beach: Cognella. 2019.	46	276

3.3 数据编码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首先对所选教材中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意群进行系统性编码，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说明具体文化在跨文化教材中呈现的内容与方式。

研究以意群为基本分析单位。意群指完整包含至少一条中华文化信息的文字内容，其长度可以是一个句子、一组句子、一个段落或一组段落。意群的选取由电子检索关键词（如“China/Chinese”“Confucian/Confucius”）和人工辅助阅读共同完成，以确保完全覆盖教材内容，避免遗漏。

对文化内容的编码主要参照了Moran（2001）提出的文化内容分类框架。该分类包括：（1）文化产品，指由某一文化群体生产及使用的人工制品，包括有形的建筑、服饰，也包括无形的语言、音乐和政治、经

济、教育机构等；（2）文化实践，指文化个体的行动与互动，如言语交际、行为准则和禁忌等；（3）文化观念，指文化产品背后所反映的文化群体的基本观念、信仰、价值和态度，如价值观、信仰等；以及（4）文化人物和文化社群（此处将原框架中的两个部分合并处理），分别指代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个体或群体，如著名的人物、民族或宗教团体等。同时，根据教材的具体情况，增加了细分的（5）文化地域维度，包括泛指和特指的地理区域。

对文化呈现形式的编码包括三个维度：（6）呈现位置；（7）共现情况；（8）理论关联。呈现位置依据意群在教材文本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内容所承担的主要功能编码，划分为正文和非正文两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再根据呈现的具体方式细分为简单罗列（在列举众多文化群体时，简单提到中国或中华文化元素，对内容没有加以展开或说明）和举例说明（包含有具体事件以及相关人物、时间、地点、场合等背景信息的事例）。非正文部分则包括了教材章节中独立于正文的特殊板块（如 student voices、point of view、discussion question、case study、further reading等），穿插在正文中的图片、名言名句，以及书前的序言、书后的术语表和参考文献等。共现情况的编码是根据意群中是否有其他文化与中华文化同时出现，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分类。此类编码目的在于考察呈现中华文化的上下文语境，可分为单独出现、比较关系（含对比与类比）、互动关系，或不相关四类。理论关联是指中华文化的呈现是否涉及跨文化交际的理论概念，以学科理论架构对教材文化呈现的作用。

为确保编码的一致性，本研究采用NVivo 12 Plus质性分析工具进行操作。初步阶段采用开放式一级编码，由三位编码人员共同讨论，并针对三本教材中提取的意群，根据研究问题涉及的编码维度进行分类标注。随后，参考先前研究中使用的编码类别，确定二级和三级编码，逐步形成最终的编码框架（见表2），之后再由两位编码人员共同完成剩余五本教材的编码工作。在出现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第三位编码人员参与讨论，共同协商确定最终编码。最后，为提高透明度，三位编码人

员共同审查已编码数据，以确保编码的一致性。在同一意群中，若涉及多种文化内容或呈现方式，会根据关键词将其编入不同的编码，因此总编码数量大于意群数量。

表2 编码框架

三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举例说明）
文化产品	语言、出版物、食品、经济、旅游、媒体、机构	粤语、广告、武术、春节、科技发展、庙宇
文化实践	交际、教学、工作、送礼、冲突管理	幽默、养育子女、讨价还价、沉默
文化观念	价值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	孝顺、阴阳、国民性
文化人物 / 社群	人物、社群	领导人、风水师、孔子、留学生、移民
文化地域	泛指、特指	中国（地理区域）、上海、温州
呈现位置	正文、非正文	简单罗列、举例说明、图片、参考文献
共现情况	单独出现、比较关系、互动关系、不相关	中华文化…；与美国相比…、菲律宾的华人圈
理论关联	有、无	集体主义、权力距离

4 研究发现与讨论

4.1 跨文化交际教材中呈现的中华文化内容

总体来看，所选每本跨文化交际教材在涉及中华文化的意群总量上虽然有所区别（见表1），但每本都包含文化内容的所有五个类别（详见表3）。可见，中华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在跨文化交际教材中有比较丰富、细致的呈现，既有表层文化，也有深层文化的内容。

表3 所选教科书文化内容呈现总表

教材	文化产品	文化实践	文化观念	个体与社群	文化地域
1. Holliday <i>et al.</i> 2010	22	8	27	36	9
2. Ting-Toomey & Chung 2012	35	17	24	46	54
3. Baldwin <i>et al.</i> 2014	37	17	8	46	31

(续表)

4. Jackson 2014	36	21	20	73	40
5. Zhu 2014	61	25	16	66	23
6. Liu <i>et al.</i> 2015	46	54	21	84	62
7. Martin & Nakayama 2018	61	14	25	69	44
8. Halualani 2019	29	3	9	46	19
汇总*	327	159	150	466	282

*注：同一意群可包含不同内容维度，因此汇总数量大于意群数量。

具体而言，内容中文化个体与社群的占比最大，体现出跨文化交际学科在描述具体文化时聚焦于人的倾向，这与英语教材中主要呈现人物的结论相似（Lee & Li 2020）。本研究所选教材中的人物既包括泛指의归属为中华民族的不同群体（如内地人、香港人、美籍华裔），也包括不同身份或少数民族个体（如学生、艺术家、藏民）。

文化产品的呈现数量位居第二，其中以与语言相关的内容为最多，如汉语、普通话、汉字、粤语、中文谚语、翻译等，约占该类别的三分之一。各种机构，如政府、公司、工厂等也多次作为具体的文化语境被提及。除此以外，媒体产品如中国出品的电视、电影、广告，有关中国的出版物，以及中国历史等也是文化产品中较多涉及的方面。其他典型的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如红包、舞龙、功夫、中药等也有所涉及，但数量有限。

文化地域的呈现上一半左右是以国别形式提及中国，其次是中国较为知名的城市或地区，如香港、台湾、北京、上海、西藏等。有趣的是，一些知名度相对较低的城市，如宝鸡、东莞、温州、武汉、阳朔等也偶尔出现在教材的事例中，可见跨文化交际教材对文化的呈现也有较为随机的一面，会因作者的文化接触体验而异。

文化实践方面的初级编码较为分散，涉及大量具体行为，归纳起来最多的是关于中国人的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的描述，其次是冲突处理的方式，以及学习（如课堂讨论、教学法）、工作（如会议、谈判）和生活（如为人父母、礼尚往来）中具有一定特色的行为。

文化观念方面的编码相对集中，以传统价值观和儒家、道家学说为

主, 约占该类别的三分之二。其余还有部分笼统谈及中华文化特色, 但没有具体指代的内容。可见西方跨文化交际教材在文化观念的呈现上建构了比较明确的东西方区分 (Chang *et al.* 2006), 作为文化参照的西方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对中华文化的“他者”建构 (周宁 2005), 对文化差异的解读大多数归结于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方面。

4.2 跨文化交际教材呈现中华文化的方式

总体来看, 所选八本跨文化交际教材呈现的中华文化内容约七成出现在正文, 这与英语教材主要在练习中以隐性形式呈现中华文化的情况差别较大 (张虹, 于睿 2020; 李加军 2023)。从表4可以看出, 正文中的中华文化多以举例说明的形式出现, 说明跨文化交际教材对具体文化的呈现主要是通过事例展析文化特点。事例通常带有较为具体的语境信息, 有些还提供详细的分析阐释, 有助于直接、有效、准确地呈现文化形象。除此以外, 中华文化也常常作为某一特征 (如高语境交际文化、儒家思想) 的代表之一出现在简单罗列中。这类呈现往往以群像为主, 突出不同文化群组之间的异同。相较于前者, 简单罗列的形式提供的文化信息有限, 类似贴标签归类, 容易造成刻板印象。非正文形式呈现的中华文化内容主要集中在照片 (42) 和参考文献 (33) 两类中。由此可见, 跨文化交际学教材在呈现具体文化时的形态和信息来源都比较丰富。

表4 西方跨文化交际教材中的文化呈现形式

教材	正文 (449)		非正文 (131)
	举例说明 (350)	简单列举 (99)	/
1. Holliday <i>et al.</i> 2010	14	11	4
2. Ting-Toomey & Chung 2012	42	24	7
3. Baldwin <i>et al.</i> 2014	44	9	42
4. Jackson 2014	61	10	22
5. Zhu 2014	40	7	6
6. Liu <i>et al.</i> 2015	73	10	18
7. Martin & Nakayama 2018	59	13	16
8. Halualani 2019	17	15	16

从学科角度来看, 跨文化交际学重点关注文化多样性以及文化间的互动。因此, 在编写教材时, 常致力在有限空间内展示更多文化, 以比较的方式来促进文化学习(刘艳红等 2015)。这种做法在教材文化共现的不同方式中有所反映。

数据显示, 中华文化被单独提及的情况仅占所有意群编码的12%, 还有约70%的情况下, 中华文化是和其他国家/民族文化一起出现在同一意群, 且相互间存在对比、类比或杂糅的逻辑关系。对比关系的共现通常以直陈两种文化的差异来展示不同文化特征。比如, 下面的例子提到中华文化时是在对比西方(德国和瑞士)与东方(中国和韩国)如何处理工作冲突, 呈现了双方不同的沟通模式:

*For example, some cultural groups (e.g., German and Swiss work teams) may believe that addressing a workplace problem directly and assertively can be stimulating and spark further new ideas. Other cultural groups (e.g., **Chinese** and Korean work teams) may believe that approaching a conflict issue indirectly and tactfully can facilitate a more harmonious communication process.*

类比关系的共现与对比关系相似, 都会根据文化特征来分组罗列, 但着重强调文化间的相似性。比如, 以下例子中谈及非言语交际中的身体接触原则时, 将马来西亚、中国、苏丹、日本、尼泊尔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文化归为一类, 来说明这些文化中对同性间和异性间的触碰或拉手有不同的社会规范。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different rules about touch. For example, same-sex touch and handholding in Malaysia, **China**, Sudan, Japan, Nepal, and Saudi Arabia are considered acceptable and part of daily life because contact among the opposite sex is inappropriate.*

对比和类比式的文化呈现无疑有利于在有限的篇幅内直接、高效地让学生了解文化的异同, 但也由于其高度概括性, 容易导致简单的二元对立, 间接造成刻板印象。这种通过教材对偏见和文化定型进行的再生产, 其实与跨文化教育理念有所矛盾, 有可能无形中人为地构筑壁垒,

妨碍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高一虹 1995）。

除了比较关系，教材中也呈现了一定数量的与其他文化存在杂糅关系的中华文化。其中主要出现的是杂糅了当地文化的中国元素，多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拥有大量华裔移民的国家为背景。这些内容不仅真实反映了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共存的现实，淡化了文化本质主义的倾向，还凸显了文化的流动性，反映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发生变化的特点。

最后，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学科，包含一系列关于文化差异和文化沟通方面的理论，因此其教材中的文化呈现常与学科理论产生勾连。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具体代表在教材中出现时，约有三分之一的情况下是与某一理论（概念）相关联的。其中最常见的是文化身份、价值观（如集体主义、长期取向、权力距离）、刻板印象、文化休克等。单波（2010）曾指出，跨文化教材中的文化内容是通过各种阐释视角和跨文化理论观照得以输出的。本研究的发现也显示，当中华文化作为具体的一类文化被提及时，主要是为了将学科理论具象化。相比外语教材中的文化呈现，这样以理论和概念为主线的文化呈现方式更具系统性和目的性，有助于引导学生对文化差异形成更深层次的认知和体验。但整体而言，所选主流教材将中华文化的呈现集中在某些特定的价值观维度等理论概念上，也从侧面反映出西方学界对中华文化乃至以其为代表的东亚文化的认知还是比较传统、单一、刻板和局限的，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意识形态偏见（Chang *et al.* 2006）。

5. 结 语

根据研究结果，跨文化交际专业教材与外语基础教材的文化呈现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差别，主要体现在对深层文化的关注、理论概念框架的运用以及显性的阐释方式上。二者都倾向于将中华文化视为一个整体，较少涉及其内部多样性，但跨文化交际学将“文化”视为核心概念，其教材为深描文化提供了更多空间，更注重阐释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且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从简单的本质主义取向向复杂、多变、情境化的文化呈现转化的趋势。未来研究可以更进一步探索跨文化交际学科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界定如何影响其教材中的文化呈现，了解不同呈现方式的优势与不足。

此外，研究也显示西方跨文化交际教材在文化内容的选择和呈现方式上并非价值中立，印证了文秋芳（2022）指出的跨文化能力概念作为培养目标“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特点”（p. 11）。因此，从课程思政的角度来看，亟需开发以中国跨文化实践为基础、具有本土文化视角的跨文化交际教材，为一线教学提供更合适的材料。

未来研究还可以拓宽视野，采用语料库等大数据分析方法，将更多教材纳入分析，梳理一般文化和具体文化在跨文化交际教材中的呈现规律，洞察其所反映的学科特点与时代特征；还可以纳入学习者视角，探究教材使用过程中师生对本民族文化呈现的感受和认知，为本土教材的编写与开发提供更多参考。

参考文献

- [1] Astiandani F R, Purwati P. A Content analysis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in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 in 2013 education curriculum [J]. *Pedagogy: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21, 9: 38-46. <https://doi.org/10.32332/joelt.v9i1.2994>.
- [2] Baleghizadeh S, Amiri Shayesteh L.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three ESL grammar textbooks [J]. *Cogent Education*, 2020, 7(1): 1844849.
- [3] Byram M. *Cultural Studie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M]. Multilingual Matters, 1989.
- [4] Chang H C, Holt R & Luo L. Representing East Asian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extbooks: A select review [J]. *The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2006, 6(4): 312-328.
- [5] Chapelle C A. *Teaching Culture in Introductory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 [6] Cortazzi M & Jin L. Cultural mirro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he EFL classroom [A]. In Hinkel E (ed.). *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6-219.
- [7] Douglas H. Sampling techniqu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A]. In Islam M R, Khan N A & Baikady R (eds.). *Principles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C]. Springer: Singapore, 2022. 415-426. https://doi.org/10.1007/978-981-19-5441-2_29.

- [8] Irawan M O & Daud B. Exploring the proper cultural content in Indonesian EFL textbooks viewed from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s [J]. *English Education Journal*, 2021, 12: 122-140.
- [9] Jorfi L, Amerian M, Dowlatbadi H R & Yazdani H. A comparative intercultural analysis of two English school textbooks from Iran and Egypt [J].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Quarterly (TESL)*, 2022, 41: 33-67. <https://doi.org/10.22099/JTLS.2021.40338.2989>.
- [10] Kramersch C.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1] Lee I. Preparing pre-service English teachers for reflective practice [J]. *ELT Journal*, 2007, 61(4): 321-329.
- [12] Matsuda A. Representation of users and uses of English in beginning Japanese EFL textbooks [J]. *JALT Journal*, 2002, 24(2): 182-200.
- [13] Moran P R & Lu Z. *Teaching Culture: Perspectives in Practice* [M]. Boston: Heinle & Heinle, 2001.
- [14] Risager K & Chapelle C A. Culture in textbook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A]. In Chappelle C A (ed.). *The Encyclopedia of Applied Linguistics* [C]. Wiley-Blackwell, 2013. 1-4.
- [15] Risager K. Language textbooks: Windows to the world [J].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2021, 34(2): 119-132.
- [16] Risager K. *Representations of the World in Language Textbooks* [M].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8.
- [17] Shen Y. A literature review on studies of cultural contents in English textbooks for Chinese senior high school from 2003 to 2018 [J].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9, 7(5): 26.
- [18] Shin J, Eslami Z R & Chen W C. Presentation of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English-language teaching textbooks [J].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2011, 24(3): 253-268.
- [19] Siddiqie S A. Intercultural exposure through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 analysis of an English language textbook in Bangladesh [J]. *Journal of Pan-Pacific Association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1, 15: 109-127.
- [20] Stern H H. Issues and options in language teaching [A]. In Patrick A & Birgit H (ed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15-116.
- [21] Tomlinson B & Masuhara H. *The Complete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terials Development for Language Learning* [M]. John Wiley & Sons, 2017.
- [22] Weninger C & Kiss T. Culture i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 textbooks: A semiotic approach [J]. *TESOL Quarterly*, 2013, 47(4): 694-716.

- [23] Weninger C. Textbook analysis [A]. *The Encyclopedia of Applied Linguistics* [C]. Wiley-Blackwell, 2018. 2-10.
- [24] Xiong T & Qian Y. Ideologies of English in a Chinese high school EFL textbook: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2, 32(1): 75-92.
- [25] Zhang Y H, Ni Z, Dong J & Li J. Constructing the global diversity or reproducing the orientalist gaze: Evaluating identity options and cultural elements in an Englis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extbook [J].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22, 15(1): 130-143.
- [26] 程晓堂, 赵笑飞. 外语专业语言类教材编写的问题与建议[J]. 山东外语教学, 2021, 42(1): 40-48.
- [27] 迟若冰. 国内英语专业跨文化交际教材参考文献的内容分析[J]. 中国外语教育, 2010, 3(2): 70-74, 81.
- [28] 高一虹. “文化定型”与“跨文化交际悖论”[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2): 35-42, 80.
- [29] 葛囡囡. 中国德语教材文化呈现研究——以《当代大学德语》为例[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2, 5(4): 61-68, 93.
- [30] 胡文仲. 评介英国出版的一部跨文化交际著作[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 (1): 69-71.
- [31] 霍炜, 王雪梅. 回顾外语教材研究, 推动外语教材建设——《中国外语教材建设: 理论与实践》述评[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45(2): 102-109.
- [32] 康莉, 徐锦芬. 大学英语教材中的文化自觉及其实现[J]. 外语学刊, 2018, (4): 70-75.
- [33] 李加军. 大学通用英语教材的(跨)文化呈现研究[J]. 外语界, 2023, (1): 66-75.
- [34] 李晓楠, 张虹, 常文哲等. 俄罗斯英语教材文化呈现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2023, 44(1): 43-53.
- [35] 刘宏, 王军哲, 罗林等.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2(4): 3-12.
- [36] 刘艳红, Lawrence Jun Zhang, Stephen May. 基于国家级规划大学英语教材语料库的教材文化研究[J]. 外语界, 2015, (6): 85-93.
- [37] 马小彦, 潘鸣威. 新课标新教材背景下我国中学法语教材文化呈现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 31(1): 66-70.
- [38] 单波. 《跨文化传播》的案例教学: 意义、问题与路径[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0, (0): 134-139, 239-240.
- [39] 孙有中. 课程思政视角下的高校外语教材设计[J]. 外语电化教学, 2020, (6): 46-51.

- [40] 索格飞, 翁立平, 顾力行. 我国30年跨文化交际/传播教材的分析性评估(1985-2014)[J]. 外语界, 2015, (3): 89-96.
- [41] 王文斌, 李氏. 我国外语教育研究的理论框架: 构建与解析[J]. 外语教学, 2017, 38(1): 1-5, 18.
- [42] 文秋芳. 在英语通用语背景下重新认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6, (2): 1-7, 13.
- [43] 文秋芳. 对“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思考: 课程思政视角[J]. 外语电化教学, 2022, (2): 9-14.
- [44] 翁立平. 什么是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1.
- [45] 吴立宝, 王光明, 王富英. 教材分析的几个视角[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6, 36(23): 39-42.
- [46] 徐锦芬, 刘文波. 外语教材使用: 分析框架与研究主题[J]. 现代外语, 2023, 46(1): 132-142.
- [47] 闫洁, 吴进善. 基于大学英语教材语料库的中国文化词语分布特征分析[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4): 75-81.
- [48] 张蓓, 马兰. 关于大学英语教材的文化内容的调查研究[J]. 外语界, 2004, (4): 60-66.
- [49] 张虹, 李会钦, 何晓燕. 我国高校本科英语教材存在的问题调查[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1, (1): 65-75, 147.
- [50] 张虹, 李晓楠. 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研制[J]. 中国外语, 2022, 19(2): 78-84.
- [51] 张虹, 于睿. 大学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研究[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0, 3(3): 42-48, 91.
- [52] 张铁夫, 王凯伦, 袁睿. 大学英语教材跨文化能力培养研究——以《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为例[J]. 山东外语教学, 2023, 44(1): 65-73.
- [53] 张雪梅. 新时代高校英语教材建设的思考[J]. 外语界, 2019, (6): 88-93.
- [54] 张占一. 试议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0, (3): 15.
- [55] 周宁. 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 七百年来西方中国观的两个极端[J]. 学术月刊, 2005, (8): 11-18.
- [56] 祝华, Claire Kramsch, 张剑. 英语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J]. 跨文化研究论丛, 2019, 1(1): 57-70, 140.